

文化革命中上海三匪幹之描述

沈國權譯

譯自·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umber 9 of Volume LVI, June 1, 1967, P. 491,
題目·Three cadres of Shanghai

——尼爾漢特(Neale Hunter)是一位年青的澳洲人，曾在上海執教兩年，今年四月甫離大陸，他認為中共之文化革命是難以成功的，他以他熟知的三個中共幹部做深入式的描述，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今天大陸所謂文化革命在上海地區進行情況之一斑。——譯者附誌

發動文化革命的共產黨們，希望革命的浪潮更為洶湧澎湃，因此以前所有的跡象看來，文化革命似屬一尙未結束的工作。

中共之威信在主要城市中已遭到破壞。原因是年青的一代，特別是那些學生們，以前都是黨的忠實者，自認為是毛匪和中委會的代表，如今除了毛匪自己和他的「親密的戰友」而外，年青的一代已不復存有幻想。一些以前毛匪的親信們如何在突然中失去其寵信，學生們呈不穩狀態，即便像林匪彪之流似亦不能例外。今天一條大的裂痕起之於中共掌權之老一輩和所謂接班人之間——似乎只有虔誠的宗教信仰方可使兩者間的關係溝通起來。

另一種關於中共前途的重要論點是，例如，以往中共總是以會議中大的決定來作教條之方式，此後將不復發生，只有和毛匪思想相融合的決定方可認為正確。以短時間來看，使全匪區人民均迫以毛匪語錄作為思物之範疇，似可收效一時。若以此種錯誤作為指導方針，則未來的結果將會比目前景況更為糟糕；若以長時間來看，不論如何(目前景況實已存在)一種新的階級幹部領導將會取代今天的毛匪策略，而且一般人民均願接受指揮。例如今天上海新起來的領導者就是當日市委會認為的黑線人物，而現在却已得到一般人的効忠。

其次關於匪軍中之基層幹部問題，這些幹部由於文化革命而發生了動搖，但基本上沒有改變。此一運動之目的要「觸及靈魂」，要從他們的寶坐上踢開，要從羣衆中打出去，在今年的二月和三月間，主要的是進行承認過失和接受批判。

文化革命運動所能使他們領受到的只是件憾事而不是件所謂革命事業。中共今日之低級幹部必需要作到的是謹慎行事，想用毛匪思想使老一輩和年青一輩的破痕獲得彌補——和以往一樣執行欺騙工作，除非文化革命能重振其鼓，使其老大的黨得以返老還童，使其新生，否則就應該承認部份的失敗。容我在中共境內停留期間，就其中三個人物所發生的遭遇作一描述，我常常是不用他們的真實姓名。

● 周真諦 ●

周真諦在上海外語研究所英語系部門工作，他的最大願望就是執教。由於他是中共的老黨員，因此他可升任為副院長。他是千百個我們所知道的中共少數的官員之一，亦即所謂「基層幹部」。我能認識中共就是由他介紹給我的。當我進入中共境內時，他便帶我遊覽北平，在他的交談中，使我領會到帝王宮殿的真意，萬里長城和明陵等，事實上，他和我同屬北平的觀光客，似無分別。

當我們到達上海時，他直接就陪我來到上海大廈的第十二層房間，晚上憑欄鳥瞰全市夜景時使我最初感覺到有點吃驚。街燈落莫於大S帶形江水的西邊，蘇州河上的船隻曳動着，黃埔灘被水銀燈光耀得非常明亮。我憶起他站在我的身旁，不時咬着他不舒適的假牙格格作響，他說：「這就是上海」，「這是一直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我們中國人，在毛主席和黨的領導下，成為工人的天堂」。

他說：「這是蜜糖和牛奶的天堂之地——一個未來的樂園，但距離現在尚遠——所統治一切。」他的語句慢條斯理，生動的英語句子流露着似乎每樣事情在共產世界裏都是偉大的，但事實上，可能是長時期錯誤的延伸，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

在文化革命開始之初，我就不再聽他用那種高度的氣質來講話。

長時間的相聚我必須承認，周真諦雖然他是個激頭激尾而道地的應聲虫，苟延殘喘於這個多變的政權中，任何人似乎都會打倒他。他必須學習讀報紙上所說的話。但他只對兩樣事情感到興趣，一個是作教師，一個是求全家庭完整無損。他爲了取得這兩個理想的實現，會身歷千辛萬苦。你不能說他自私，他爲了保護他的家庭和工作，他不得不丟掉他的靈魂去做事。由於周真諦難以生存，故而只有應用笑臉攻勢。

他雖然有多方面的經驗，但文化革命差一點結束了他，在他生命的第一遭，由於他發現富於想像的黃金時期已付之東流，在他被迫要作一個決定時，而此一決定是整個生命都全繫在這上面的，然而唯一的權力就是保衛毛主席和共產黨，以狂熱之心來爲革命大業而効忠送死。他的選擇結果一如他的本性，他選錯了。正當革命造反派方興未艾之時，研究所的黨委決定出而奮抗，他變成了書記的一名工具，利用他並以免職爲要挾圖使他來牽製造反派的勢力，（他代表毛主席和黨委會）要具有信心一定能戰勝對方，周真諦工作謹慎以圖保護己身，要寫嚴厲指責性的大字報來對抗革命造反派的學生們。

時光荏苒，時間帶來了答案，周真諦失敗了，去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革命造反派攻入黨部，掠走了文件，搜查黨委一直查禁的黑名單，左派的、走中間路線的和走右派的老師和學生。在最近的階段中，周真諦加入了抗暴的行列來對抗一小撮走反革命法西斯主義的人。

其後有了大的轉變，當革命造反派找到了文件，知道毛主席暗示着喜愛革命造反派時就作了一個明白的表示，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日時，研究所裏一半的人換了邊，以黨書記做爲一個熱餅似的，周真諦和其餘的人因爲犯了錯誤而極爲狼狽。

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時，他仍似爲烏雲所籠罩着。他徒然的從毛語錄上高吼着語辭，揭起了他生命中最好的標語，學生守望着他而藐視他。他們不

文化革命中上海三匪幹之描述

讓他輕易的脫離監視，但到了二月份，對共幹頒佈了一項新的妥協政策後，對他無疑是現了一道曙光，如果周真諦可以站出來，而且能公開抨擊黨書記和他的尾巴們的話，則革命羣衆歡迎他來歸。

我參加了好幾次類似的會議，證實了周真諦和其他的人作了一項很好的煽動工作。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可以想像到他們工作的艱辛，由小的力量而湊合成一股相當的力量。有一天夜晚他來旅館看我——有一種好的預兆顯示他平安無恙。他和幾個造反學生一道來，我抱着猶豫的心情歡迎他們，並且告訴了他們在面臨逆境時應如何去對付。由於幾個月來這些學生對研究所實行了恐怖政策，那些可怕的紅色造反野戰軍，嚴厲懲罰所有的走資階級當權派的反動份子。

三月份要他作一般性的自我批評，兩次見於大字報，當時我是被邀請了的，但每次又都被取消了。因此這羣學生能够批評劉匪少奇和他的「如何做好一個共產黨員」。當我四月離開上海的時候，周真諦差不多要恢復原職，他雖然失去尊嚴，但他却保有了他的職位和家庭，他雖然犯過錯誤，但他却在官場上又可以慢慢地紅起來。

文化革命的諷刺程度還不是周真諦所關心的，而他所關心的是如何使他自已成爲一個別人認爲的忠誠人物。事實上，他所受的驚駭不算大，所謂「觸及靈魂」的運動本身就是一種失敗的方法；因爲他是一個資產階級當權派中的反動份子——雖說他只是其中的一個小角色，本來他就沒有受到真正的改變，除非他現在變聰明了可能才不致再受到同樣的欺騙。

● 周這個 ●

另一位周在研究所裏黨部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之一，他是我到達中共區內認識的第二人，前面一位和現在要說的一位都是姓周，我給這第二個姓周的起名為周這個，因他在說話中常帶有「這個……這個……」的緣故（即中國的「之」之意）。「這個」有停頓的意思，平常連學生們也是這樣的叫他，當他們聽他說起例如像「毛澤東，這個……這個思想」時，每每會哄堂大笑起來。

我最初碰到周這個是在中國大陸北方的一個海濱，這是我們去上海任教一年開始前的一個共遊假日，我感到驚訝，像他這樣的中共幹部（他是該研究

所(的副所長)，在夏天能和外國教授們在一塊有一個月(的假期)到海濱去打網球和悠閒的躍躑，從我們的談話中我領略到他是當日在延安追隨毛匪左右的人物；目前他手下尚有不少軍人跟隨他，在拳擊家被打垮似的頭頂上留着水手式的灰色頭髮，他有一種氣質，這和他的名字不相融合，是一位沉默，言談時精神抖擻的一個人。

我從開始就喜歡他，特別是我叫他房間去解說關於新的教育體系時，他對所有的事情無所謂而率直，對黨的經驗豐富，並要我提出改進和新的體系方案，他給我的印象是剛強、懇直，一個最好典型的行政官。

當文化革命開始時，他是第一個被抨擊的人，早在去年六月時，就有大字報控訴他是腐敗的官僚政客，脫離羣衆，並伴稱身體健康不佳而藉以逃避每週一次的勞動。我自忖着，他最後的結果不知會怎樣？他的革命功業對他已絲毫沒有幫助，他可能會下放到某地去作一個普通的人，他的職位將由青年而更精悍的人去接替。充滿着造反氣氛而此刻正是造反運動進入高潮的光景，我爲他很難過，雖然他有一個逃亡的機會而他竟自願放棄，他竟是這樣的一個無所謂的人，不過話得說回來，畢竟他已是一位快七十歲的人了。

我不能犯太多的錯誤，因距離退休時光尚遠。很幸運的他被批判時是在文化革命的早期，因而他逃過了，免受和黨委書記遭受同一命運。同時周這個又能獲得新的顯要職務，其原因亦即此。

所有這類事情此後被陸續地披露出來，周這個一度身任黨委書記，後來被資本主義反動派們所批判，現在研究所的學生們都說他好的事情。遠在一九五七年時，對上海教育局提出一項教學改革方案，當時正值大躍進時期，而周這個是毛匪的同路人，當時會有一個結論就是「二總是多於四」，那就是說，有一個學生用功兩年其結果比一個苦讀四年的學生的成績還要好。教育局沒有注視這一個問題，這對周本人來說却是一件幸運之事，因爲那位教育局長在文化革命期間，曾受到猛烈地攻擊和批判。

因此周這個成了一個殉道者，因他爲黨委書記而犧牲，周却成了代罪的羔羊。結果在三月間，共幹們有一次機會去參加造反組織，他完全復職了，到四月初，當革命委員會來慶祝，老師、學生、匪幹所謂三結合的勝利時，誰應出來主持是項會議(應該是市委會的主席才是)然而却是周之私人名義担任的。

我參加了開學典禮，由於受了某些限制而情緒稍有緊張。記得兩年前我參與開最初的一次會議，這位會發表了演說，坐在那個原來座位的位置處，今天却換了教授們坐在他的旁邊，却是似身懷炸彈的革命造反派本身，邊喊邊鬥，慘無人寰的去懲罰他們所謂的壞人，他們把所長拖下台來，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爲是一種極大的諷刺，我的翻譯員笑了，她啊了一下，「但是你要想想看，在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在我離開中國大陸前不久，該研究所組織了一個新黨，當時開了茶會，此時周這個情緒穩定而自恃，他發表演說，題意是如何完成一萬里長征和協助他們締造社會主義；他開了個玩笑，這在當時的情景來說是不太容易的，他說：「我們是革命造反派，但我們要對革命造反派說再見」。我當時皺我的眉頭，我很難作爲一個擁毛派的楷模，他繼續說：「你們臉上表現着美帝國主義；願意做他們的走狗，那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大家都笑了，這倒不是因爲話的本身可笑，却是因爲他的語態輕鬆之故。當時我也講了話，主要是謝謝他們，在整個的時間裏我一直注視着周這個，而他也時地看着我，彼此間也不時地作了會心的微笑，我和他都在想着「好啊，你這個壞蛋。」

● 張復南 ●

在我到達中共境內一個月以後，張復南告訴我文化革命的情況。這位年青人在該研究所慶祝成立紀念時代表學生發表了談話，我認爲教授和共幹們的講話都很激昂，這也是在我家鄉所慣用的。他們繼續向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鬥爭，這是由那些對所謂毛匪思想有心得和在工作上具有創造性的又紅又專的人主持的。張復南會作發言，語調乾澀，活像一口大炮，他的話講得太快，我簡直一個字都聽不懂，我的那位翻譯員離我的座位後方很遠，張復南所說可能不太重要，他的動力驚人，使我像是觸了電，演講完畢，掌聲持續了好久方告停止，我在那一段時間裏只管作我的而沒有看別人，翻譯員本來很傲慢，後來我開始稱讚他，我自己暗想着，我這個窮教員，可必須要跟他在一塊，我問他還讀那國語言時，他只回答「英語」，「他會是你的學生！」

當我了解他時，我發現他有一個引人的語調和風度，是我見到最文雅的一個，他特別是在研究政治學時，顯得極聰明，我知道他正當預備黨員時期，因此他希望每樣事情均能有所表現。

從文化革命開始時，張復南很堅定的站在黨書記和黨委這一邊，就沒有另外一個學生如此的賣力，當責難造反派時，挺身而出備加保護他的領導人。他特矜自己是一個英雄的坯子，把年青而壯碩的身子置身於他敬愛的毛主席和牛、鬼、蛇、神之間，然而不幸的是他出身於資產階級；他的祖父是個商人，他的家現在仍然住在舊法租界最好的地方，他坦誠的告訴我：「他的祖母」，他苦笑着說，「時常去教堂，把錢給那迷信的騙子——牧師。」

當紅衛兵開始搜索資產階級份子房子的時候，張復南知道他家一定在名單之列，因此他也希望參加突襲隊，黨書記對他永蒙其羞之事，曾私下勸告他去北平參加革命「經驗交換」徒步串聯，如此可免除父母被清算目睹現場時自身所受的苦痛。

張復南不能成爲一個紅衛兵，這是由於他的階級成份不夠，他在研究所裏會負責一個聲勢較大的溫和派系。該一組織之政策，人數多而時間亦較長，以對抗任何形式的暴亂和攻擊十六條，主張對批判黨人應有一合理的對待。在另一方面說來，造反派準備在任何時期掃除背叛毛主席的革命羣衆所施用的白色恐怖。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元月，研究所裏的極端分子力量發生動搖，張復南以及一個萎縮的集團出來打擊異己，雖然他們原來組織被迫解體，他們的領導人遭到嚴厲的攻擊當兒，說也奇怪，我的全班學生都和他站在同一邊，餘下的人無法保衛黨書記，黨書記此時則需要人幫助，却又拒絕參加造反派。此時要他們全體公開宣稱，說他們妄自稱大，在運動中犯了很多錯誤，因此要接受自我批評。

最後（並不是四月才開始）敵對的局面瓦解了，我還在那裏時，張已換了邊，那時是我快要離開大陸不久的時候，因此他的那次講話使我一直迴旋於腦際，思潮每想到張復南內心情緒總是無法控制，他作自白時，他沉重的敘述他所犯的錯誤，他敘述黨書記是如何利用他來作爲擋箭牌，他原來是一個熱愛毛主席後來却反對毛主席，他痛哭流涕，對往事似哽塞於喉而不能出

，好似一未決犯情緒激動而指手劃腳，他的每一句話完了總是泣不成聲，整個面孔似已成了一個淚人。

另外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純戲劇性的場面，我看到一個十歲的女孩子凌辱一個誹謗他父親的人，她所說的沒有一個字是真實的，因爲我很了解，她所說的話是由我的一個學生替她事前寫好的演說詞，而這個學生幻想他是一位修辭家。話說回來，關於張復南所作的坦白我想他一定是真的，我同時相信他當時所受的打擊是非常大的。很多廿歲的青年人因情感的易於衝動而藐視他們的朋友，使全體不能忍受的學生恨之入骨。

到底他是哭了，似乎哭了過後覺得很快，至少有一部份是屬於痛快的，但其餘的一部份又是怎麼樣的呢？他在他的生活中忠於什麼，他忠於黨還是那些黨員們，他能完全獲得別人的信任嗎？

以上所說的三個人都有他們一段狼狽的過去。他們雖然飽受過個人的極度苦痛，但從這裏面却也獲得了一種啓發——一種相當程度的犬儒主義的啓發。在一年以前，年青人都可以不受羈束的有這種思想，犬儒主義是共產主義所不能忍受的一種理論，而共產主義目前却又利用這種主義，因此這種主義在今日大陸上是難以根除掉的思潮。

毛匪知道這些，故在今日大陸上冒險進行文化革命運動——中國人民的樂觀主義——毛匪必須在心目中據有一種確勝的把握，一直要得到證明這種勝利確已贏得，否則文化革命必定被認爲是失敗的，當無疑問。

——上接第51頁——

匪共領導者的基本觀念。所以匪共現階段的對外強硬，好戰態度是文化大革命鬥爭的延長。文化大革命的鬥爭越到收拾階段，其混亂越深。廣東、四川、安徽、青海、新疆、內蒙、西藏等省毛派與反毛派的武力衝突，工人與紅衛兵的糾紛時有所聞。就奪權成功已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黑龍江省、山東省、上海市、貴州省、山西省、北平市等地方來看，其混亂亦方興未艾。如此匪區由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動亂，可以看出匪共外交的日暮途窮。匪蘇閭牆被認爲是毛澤東與黑魯曉夫性格上的差異，現在匪共外交的走投無路亦可說是毛澤東性格的反映。

原文載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日本世界週報第四十八卷廿四號